第 55 卷 第 2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5, No. 2
2018 年 3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r. 2018

当代文化发展的新特征

丰 子 义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加强文化建设、推进文化发展,必须对当今时代的文化发展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只有对当代世界的文化格局和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有一个总体的了解,才能看清我国文化在世界格局所处的方位,明确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与出路。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当代文化发展主要呈现出这样一些新特征:文化发展的交融化、文化驱动的资本化、文化趋向的差异化、文化生产的个性化、文化风险的集聚化。对这些新特征加以深刻的揭示和分析,有助于深入地审视我国的文化发展现状,进而有针对性地推进文化的合理发展。

关键词: 全球化;当代文化发展;新特征

中图分类号:G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8)02-0047-10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推进文化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对当今时代的文化发展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只有对当代世界的文化格局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对当代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看清我国文化在世界格局所处的方位,才能明确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与出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文化发展也是如此。

伴随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文化的发展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以往社会相比,无论是文化发展的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是文化发展的方式还是条件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而深刻,以致当今时代被有的学者称之为“文化时代”①。对于当代文化发展,尽管很难作出全面、清晰的描述与概括,但其一些基本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对其加以深刻的揭示和分析,有助于对当代文化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总体而言,当代文化发展主要呈现出这样一些新特征。

一、文化发展的交融化

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整体,通常被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等主要领域。由于社会发育程度不同,这些领域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不同。在传统社会即前工业社会,社会生活尽管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但其分化的程度是有限的,因而基本上处于“领域合一”的状态;而且,政治统摄社会各领域成为一种常态。诚如马克思所说,在中世纪,“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②。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受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社会生活开始日趋“领域分离”③,且分离的程度越来越大。这种分离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导致了社会的合理分工,促进了各领域、各部门效率的提高,同时促进了全社会现代性的发育。在这种分

收稿日期:2018-01-05

作者简介:丰子义,男,山西应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研究”(项目编号:12&ZD009)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 D. 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艺复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84 页。

③ 参见王南湜:《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离过程中,文化自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在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结构又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社会生活领域重新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当然不是原始的回归,不是取消各个领域的独立性而重新回到“领域合一”的状态,而是在保持社会合理分工的前提下通过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融合,交融化是其显著特征。所谓“交融化”,主要指各个领域不再仅仅是以外在的、分离的形式出现和运作,而是相互贯通、相互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关联和发展格局。在这种交融化的过程中,文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不再完全按照原有的轨道孤立地发展,而是以一种无形的、内在的力量贯穿于其他领域,成为这些领域的内在要素,并在与其他领域的交互中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样一来,文化与其他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文化的作用和文化的发展也日益弥散化。

文化发展的交融化特征突出地表现在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随着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已经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文化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支柱,文化形态的无形资产日益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新趋势,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正在成为新的竞争优势。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主要是通过产品、企业、产业这些方面来实现的。

从产品方面来看,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越来越依赖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随着消费者对于产品品位追求的提高,产品的文化内涵也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在消费产品时不再仅仅是在消费物质,同时也是在消费文化,因而产品的价值更突出文化价值。生产者只有提高产品的文化价值,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保证产品的价值实现。不仅如此,产品利润也越来越取决于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一个没有文化的产品肯定没有市场竞争力。这就要求在产品的设计、制作过程中“把死的做成活的”,即给产品注入文化元素,让产品有更多的文化含量、故事含量,从而使物质产品同时成为文化产品。

从其企业方面来看,其活力和竞争力日益依赖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提出,企业是“把资源变成财富的组织”。但他所说的资源只包括物质资本等有形资源,企业的利润也主要来自于有形资源。其实,资源和资本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资源和资本,是一种更为高级、更为重要的资本。相应地,企业不仅是“把资源变成财富的组织”,而且是“把文化变成利润的组织”,企业的财富和利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资本的投入。为此,企业要增强活力和竞争力,必须注意文化的软实力,用文化整合资源,同时在企业管理中不断吸纳各种文化因素,实现文化与管理的相互融合。

从产业方面来看,其升级换代也越来越依赖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过去,文化就是文化,产业就是产业,各自分离,互不相干。现在,随着文化对产业的逐渐渗透,文化对产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如休闲产业、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兴起,业态革命的出现等。为延长产业链条,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好多国家都注重在产业层面实现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让融合后的产业“虚实结合”。一方面,把文化做成经济,即把文化从文化领域延伸到实业领域,将“虚”的文化做成“实”的产业;另一方面,把经济做成文化,即把文化元素、人文元素融入产业中,让物质产业文化化,使文化成为产业创新的源泉和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文化的驱动下,产业升级的步伐明显加快。

文化发展的交融化特征不仅表现在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上,而且也表现在文化与政治、社会等的融合上。文化政治化和政治文化化是其突出的表现。虽说近代以来文化逐渐摆脱了对政治的依附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但在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又变得日益密切,二者相互渗透、相互支撑,日益走向融合。在当代西方社会,无论是宏观权力还是微观权力都有相应的文化包装和文化支撑,而众多文化又都程度不同地内含着某种权力(或者是话语权,或者是文化支配权、社会支配权等)。文化与权力的结盟成了一种显著现象,由此遭到西方不少学者的质疑与批判。如福柯就通过权力与文化“共谋”的分析,揭露了当代政治与文化的发展现状。如果说福柯的分析还主要是在社会的微观领域,而在社会的

宏观领域也是如此。就冷战之后的情况来看,西方一些国家往往不再是以武力,而是以自己的某些文化价值观念作为标准,来强力推行自己的权力和政治。看似文化、价值的东西,实际上背后包含着激烈的政治争夺。

由于文化呈交融化、弥散化的发展态势,因而文化的功能也日益扩大。文化逐渐越出原有的轨道,快速走入社会生活,对社会发展形成巨大冲击。像当代新兴的文化,不仅直接对冲着各个国家的传统文化,而且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其功能不仅有文化功能,而且有经济功能、政治功能、社会功能以及消费功能、教化功能、审美功能等,各种功能集于一身,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文化发展既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所谓自律,就是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违背自身的规律来进行;所谓他律,就是现在的文化发展并不是纯文化领域的事情,不能就文化来谈文化,必须从总体性的视角,纳入社会总体性的联系及其发展规律中来研究和推进文化的发展。这应当成为我们在文化发展规律上的理论自觉。

二、文化驱动的资本化

文化在不同时代的发展,是和特定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文化主要依附于权力和等级,因而是和权力、等级捆绑在一起并受其推动的,由此产生出不同等级的文化。而在现代社会,文化则主要依附于资本,并被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资本成为文化发展的驱动力。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资本对文化的控制与推动不是在减弱,而是在愈益增强。

资本之所以能够代替权力和等级而将文化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推动其发展,原因就在于资本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其一,资本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生存,不停的变革导致文化发展。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① 正是借助于这种不断的变革,文化才得以长足地发展;也正是借助于这种变革,文化的创新才不至于仅仅成为个人行为,而是成为社会行为。其二,资本要发展,必须克服一切文化限制。这种限制既包括地方的、民族的文化限制,又包括传统的文化限制。为此,资本极力推崇并牢固确立与自己一道发展起来的文化、理念,并将这一套文化、理念作为“普适的”东西来看待,同时借助资本的力量来向世界推行。通过这种推行,文化逐渐走向世界,并在普遍交往中获得快速的发展。当然,这种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文化殖民的过程,是文化霸权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其三,资本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看待文化价值,由此推动文化沿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一件文化产品是否有价值,主要不是看它的文化价值,而是看它的交换价值,能够给资本带来利润的便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是没有价值的。这样一来,所有的文化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一切能够进行交换的并能为资本带来利益的才是“有价值的”,价值通约主义成为衡量和评判文化的基本准则。这就必然刺激文化向着商品化方向发展。总的来看,文化之所以和资本捆绑在一起,就在于资本的本性使然。资本的本性就是要实现价值增值、获取最大利润,为此,它就必然要把各种事物、现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其赢利的手段和工具。文化自然不会例外。资本总是力图借助文化来获取更大的利益,因而既要刺激文化消费,又要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同时将文化元素注入资本,由此来扩大文化市场和资本市场,使资本赢得更多利润。

由于文化日益受资本的控制与支配,因而文化发展的逻辑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的文化发展基本上是内容决定形式,即文化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小说、诗歌、戏剧、绘画、舞蹈等)总是表现一定内容,是为内容服务的,随着内容的变化,文化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在现在,情况则发生了较大逆转,文化的发展不再完全是内容决定形式,倒是形式决定内容,文化形式成了更为看重的东西,因为形式更能吸引眼球,更能带来利益,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5 页。

容无足轻重。因此,文化形式的花样翻新便成了文化追逐的重点。文化发展之所以形成这样的逻辑,恰好契合的是资本的逻辑。资本逻辑推行的就是“抽象统治”,它把一切财富、资源都货币化、符号化,即形式化,因而只关心的是这些抽象的形式变化,至于内容无关紧要。正由于作为抽象形式的货币增殖是最为根本的,所以货币是最具决定性的,其他具体内容都要服从货币的“抽象统治”。当代文化发展逻辑不过是资本逻辑的反映而已。

在当今时代,文化资本化和资本文化化日益突出,并成为一种发展趋向。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一是文化产业与资本的结合不断升温。在国外,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得到资本的强力支持,其特征是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方式多样化。如在美国,各个文化产业集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融资体制,一些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其背后都有金融资本的有力支撑,文化产业集团与金融集团间互相渗透、互相参股和控股,二者之间建立起稳定的伙伴关系。英国则是对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实行“政府陪同资助”,即如果企业决定资助文化事业,政府将陪同企业资助一项活动为该项活动的质量和成功打上“双保险”。韩国在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机制中,运作“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这是以动员社会资金为主,官民共同融投资的运作方式。① 虽然各个国家的做法不一样,但共同之处就是不断加大文化产业与资本结合的力度。

二是文化趋于商业化、娱乐化。文化原本与商业互不搭界,但在当代,二者的关系颇为密切。受资本的驱动,文化极力向商业靠拢,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日益商业化,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变成了纯粹的商品。与此同时,文化的运作也充满了娱乐化,文化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再被看重,娱乐消遣的效应更受青睐。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扩展,助推了文化工业的发展。文化工业的兴起,一方面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文化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如文化工业产品的过度复制和批量化生产对艺术的生命、价值就是一种摧残。对此,许多西方学者给以深刻的揭露。如美国学者詹姆逊就认为:“当前西方社会的实况是: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商品社会的规律驱使我们不断生产日新月异的货品(从服装到喷射机产品,一概得永无止境地翻新),务求以更快的速度把生产成本赚回,并且把利润不断地翻新下去。在这种资本主义晚期阶段经济规律的统辖之下,美感的创造、实验与翻新也必然受到诸多限制。在社会整体的生产关系中,美的生产也就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②

三是文化的“麦当劳化”。作为美国快餐的一个著名品牌,麦当劳流行于世界各地。它与其用料配方、制作工艺、生产流程、营销策略、经营理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和产业模式向其他领域扩展,这就是“麦当劳化”。文化发展也是如此。效率至上、可计算性、可预测性以及可控制性这几项麦当劳的要素,逐渐向文化领域渗透并成为文化成果评价的指标。③ 麦当劳化的趋势虽然提高了文化生产的效率,扩大了文化的社会影响,但也导致了文化原创性的减弱和学术的平庸化。为此,麦当劳的趋向受到许多学者的诟病。如德国学者明赫就提出,“欧洲社会学需要抵制这种趋势,正如它为保存自己和世界的多样性而需要抵制文化整体上的麦当劳化一样,这就要求欧洲社会学实现同样深入的职业化……但它决非是要重走美国通过标准化实现的职业化道路”④。

资本逻辑在文化领域的推进,其效应确实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大大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给文化注入了强有力的兴奋剂和驱动力;另一方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文化的人文性、公益性,削

① 参见邹长平:《国外文化产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经济研究导刊》2008 年第 4 期。

②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429 页。

③ 苏国勋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8 页。

④ 明赫:《美国与欧洲的社会理论》,《国外社会学》1998 年第 2 期。

减了文化的社会效益,降低了文化品位。对于当代资本逻辑,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不能简单地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否定,而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资本创造和推动文明的效能,同时又要防止资本在文化领域的盲目扩张,防止文化的畸形发展。让资本造福文化、助推文化,这是文化发展的合理选择。

三、文化趋向的差异化

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孤立发展时期到多中心时期再到全球化时期。与近代以来的全球化相比,今天的全球化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资本的快速流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一轮全球化形成的格局是:经济日益一体化,文化则日趋多样化。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动,推动了文化的世界性发展,另一方面又促使文化发展走向差异化、多样化。在全球化条件下,从文化的内容到文化的形式,从文化的载体到文化传播的渠道等,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而且,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原来各种文化发展隐性的差异变成了显性的差异、自发的差异变成了自觉的差异,多样化成为其明显特点。

文化的差异化和多样化对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行为的冲击是巨大的。对此,有些西方学者曾作过深入的分析和描绘,将文化多样化的时代称为大分裂的时代。如美国学者福山就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正在走向“大分裂”,但最根本的分裂是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的分裂。“正当西方社会的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之时,却出现了这样一些负面的社会趋势:这些趋势说明,西方社会中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些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正在变弱。”“这些变化使 20 世纪中叶工业社会中盛行的社会价值观形成了大分裂。”①福山所说的社会价值观念大分裂,并不是仅指某种价值观念自身发生了分裂,而是指新产生出来的各种文化价值观念不再像以前那样共同认同作为主流的价值观念了。由于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被打破,因而社会价值观念逐渐走向分裂。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这样的分裂无疑最具挑战性,它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

文化发展的差异化和多样化以及文化价值的分裂又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冲突与竞争。在后冷战时代,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冷战时代的终结,使得意识形态的竞争逐渐让位于文化的竞争,文化冲突日益凸显。首先是文明冲突的广度和深度大为加剧。与以前相比,文明冲突不仅在空间和时间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涉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冲突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强烈地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同时深刻触动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心理特质和文化认同。其次是文明冲突日趋复杂,表现为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冲突。与以往的冲突相比,现在的冲突既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又是现代性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同时还是地方性文明与全球性文明的冲突,各种冲突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多变的文明冲突图景。再次是文明冲突的力量严重失衡。如果说,在以往社会中诸文明的冲突是相互的、多向的,那么,在现代社会尤其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多向的冲突基本上变成了单向的冲击,长期存在的文明均势被打破。目前的国际体系基本上是由西方主导的,它从其形成之日起就是不平等的,因而文明的冲突实际演变为西方文明的单向冲击,非西方文明因缺少相应的“对冲”力量而长期处于守势。当年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发展的态势时就曾经指出,正像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这种描述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世界文明发展。

文化差异和文明冲突直接造成的矛盾就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将每一个国家都卷入其中,以致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都难以置身事外。然而,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又直接危及各民族文化的正常发展,因而各个

① 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7 页。

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觉地关注自己的文化,力求加快自己的文化建设,以凸显本民族文化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价值,捍卫本民族的文化权力和利益。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越是全球化,各个国家越是强调文化的民族化或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成为文化发展的一大矛盾,并成为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

与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相伴随的是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矛盾。在全球化条件下,加强各种文化的交流、交往本来是正常的历史现象,但在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中,这样的“全球化”极易蜕变为文化的“同质化”,即强势国家极力推行自己的文化,力图将所有国家的民族文化均纳入自己的文化模式之中,形成同质化的文化。所谓文化的全球化,就等于“西方化”“美国化”。正因为同质化的威胁日益严重,因而作为反弹,异质化的吁求也越来越高。异质化就是主张文化多样化发展,不能强求文化发展的“模式化”,更不能强求文化的“同化”,因为模式化和同化的结果,就是众多民族文化的消亡。面对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矛盾,各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往往处于两难境地:要避免文化同质化的危险,有可能游离于全球化,不利于文化发展;要参与全球化,又确实承受着文化同质化的压力,影响和干扰民族文化的正常发展。其实,要摆脱这种困境,不在于对同质化与异质化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关键在于处理好文化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文化要想得到切实的推进和发展,必须融入全球化,“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全球化过程中增强自己的文化竞争能力。拒斥全球化的民族性,事实上是靠不住的。因此,抵制文化的同质化,并不等于拒斥全球化;通过文化的全球性来寻求和发展其民族性,这是应对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准则。

文化的差异化发展和多样化发展尽管带来诸多矛盾,但它还是体现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同时也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势。正像自然界需要多种多样的生物、物种才能保持生态平衡一样,文化生态的平衡也有赖于多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正是有差异,才有鉴别,才有相互欣赏、相互竞争,由此形成文化发展的动力。人类文明就是在多种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推进的。为此,对于文明的冲突也应当给以理性的看待。这里且不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政治意图如何,仅就文明冲突的一般情况而言,文明冲突并非仅仅是一种消极现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化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产生一定的差异和冲突是自然的。在文化领域,没有了差异,没有一定程度的竞争,也就没有了生机活力,当然也就没有了文化进步。就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离开了儒、释、道的相互碰撞与冲突,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状况。西方的文化也是如此。离开了对各种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也不是今天这样的状态。因此,应当合理看待文明的冲突。当然,这绝非主张和倡导文明冲突,尤其不能掉入“文明冲突论”的陷阱,应当使冲突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避免对抗性的冲突,力求保持文化的和谐发展。总之,尊重差异,共同发展,这是对待人类文化应有的基本态度。

四、文化产业的个性化

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传统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是“自然”的。所谓“自然”的,并不是讲文化非人为的,是纯粹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说文化的生产和发展主要不是刻意组织的、不是有计划地设计和推进的。虽然历朝历代也有官方组织的“文化项目”(如辞书的编写、古籍的整理、乐舞的创作等),但就总体而言,文化的发展是一代代延续下来和积累起来的,有其“似自然性”的特征。官方和民间的作用同时发挥,民间的作用和影响往往会更大、更持久。文化发展的这种状况是与长期实行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分散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往往产生的是分散的文化发展方式。而在现代工业社会,这种方式逐渐被打破,开始形成了组织化的模式。特别是福特制的出现,使文化的组织化发展到了极致。福特制的基本特点:一是规模化生产,即通过更细的分工、更广泛地采用机器来实现更大规模的生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标准化生产,即在泰勒制原则指导下,通过劳动的标准化、技术分工和机器生产的专门化,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实现批量化的生产;三是刚性化生产,即在生产组织、管理结构、企业运营等方面都表现出刚性的特征,很少有灵活性的空间;四是垂

直型的组织形式,即企业为了提高效率和节省成本,通常运用的是周密的计划和决策、强有力的指挥和控制以及严格的监督和奖惩来保证生产流水线的有序高效运行,于是就形成了垂直管理的组织形式和企业中的等级结构。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推广到文化领域,便形成了文化的组织化模式,具体体现为“文化工业”。文化工业的出现,一方面推动了大众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文化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对此,西方许多学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许多代表人物都对文化工业提出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人把文化工业看作是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文化的商品化使得创造性丧失,其次是文化的欺骗性导致思想的沉沦,再次是文化的操控导致文化的统治。在现代工业社会,大众娱乐产品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大众文化对人的操控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其他文化统治形式所不可比拟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指出:“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状况下,也会被灵活地消费。但是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起,在休息时,只要他还进行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①这就是说,在这样的操控之下,无声无息的统治也就自然形成。

在当今时代,文化又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这就是从组织化发展转向个性化发展。伴随消费社会的出现、信息网络技术和新型媒体的发展,文化生产日益个性化。特别是弹性生产的出现,对文化生产的个性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谓“弹性生产”,是相对于规模生产、刚性生产而言的,指的是生产和资本积累体制的一种当代变化:新技术赋予资本和生产以空前的流动性,因而生产的定位似乎处于一个永恒不断的流动状态,这使资本在对抗劳动力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摆脱了对资本活动的社会和政治干涉,因此又叫“灵活的生产”②。与以前的福特制生产相比,弹性生产不再强调规模化、批量化、标准化、程式化、组织化,而是突出个性化或弹性化。与这种弹性生产相适应,文化的生产和发展也不再固守组织化模式,而是趋向个性化。其个性化主要是从下述方面体现出来的:

一是文化主体日益多元化。文化的主体不再仅仅划分为精英与大众,而是日益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无论是主体的范围,还是主体的层次结构,都有相当大的变化。许多群体、个体以及社会组织等,都可以成为文化的生产者、创造者和组织者,都可以发挥主体的作用。这样一来,文化主体上的“大众化”常常以“小众化”的面目出现。所谓“小众化”,即文化主体不再以千人一面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千差万别的主体出场。文化主体的“大众化”就是由这种“小众化”构成的。既然文化主体日益多元化,那么,由此创造的文化形式也必然是多样的,这就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或亚文化。文化形式的多样化及其相互吸收融合无疑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促进了文化发展。以我国的曲艺发展为例,随着各种艺术的参与与融合,传统的曲艺形式都借助其他艺术形式得到了创新,并获得新的活力。如相声与歌舞、小品的结合产生的“表演相声”“歌舞小品”“相声MTV”等曲艺表演方式,以更加多样化的表现手法,更新了传统的曲艺形式,丰富了曲艺的内容。

三是文化生产日益去中心化。以往的文化生产,主要是由政府部门组织进行的,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门决策实施的,因而文化生产的中心化特征是比较明显的。与此相适应,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也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的。传统的媒体主要是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文化就是借助于这些媒体传播和推广的。这样的组织化,所形成的主客体关系自然是明确的,即政府部门是主体,社会民众是客体。或者说,政府部门是文化的生产者,而普通民众则是文化产品的接受者;各种媒体生产什么,人们也就消费什么。现在,随着新型媒体的出现、网络技术的

①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8 页。

② 参见德里克:《后革命氛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 页。

发展,这种格局逐渐被打破。人们不再仅仅是文化消费者,同时也是文化的生产者;不再仅仅是文化的接受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者。而且,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也在发生新的调整。虽然从总体趋势上看生产决定消费,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往往是消费引导生产,生产服从于消费。一种文化产品如果没有市场,不能被消费者所接受,那么,这种文化产品是很难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所以,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是互动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文化发展的交互性更为增强。在网上,每个人既可以是文化的生产者,又可以是文化的消费者,交互性越来越强,以致原有的中心化逐渐被淡化。

三是文化结构日益扁平化。文化生产和发展的方式总是与特定的文化构成方式密切相关。文化生产和发展的组织化一般产生于文化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文化的顶端和主导性力量是精英文化,底端是大众文化,文化的具体组织和发展一般是由上而下推动的。正是文化构成上的等级制,才形成了文化的组织化。现在,文化的结构逐渐由过去的金字塔结构转变为扁平化结构,文化构成的关系逐渐由过去的等级关系转变为水平型关系。这样的转变就意味着文化的个性化生产与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转变,才能为个性化的生产和发展提供施展的舞台;也恰恰是个性化的增强,又加剧了文化结构的扁平化。在这样的文化结构中,各个文化个体基本上都是平等的,因而其交流、交往也是平等的,文化上的“对话”代替了以往的“教化”。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对话”、参与文化创造,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由于文化结构趋于扁平化,由此带来的文化传递路线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是由垂直型传递转向水平型传递。与这种结构变化相适应,文化的管理、组织也日益扁平化,即文化的管理、组织不再仅仅诉诸行政方式和行政手段,而是更多强化了法制、强化了文化自身的管理、组织,像文化市场的规范约束、社会文化团体的协调管理、文化环境的净化和构建等,就是具体的体现。

文化生产和创造的个性化,自然加剧了文化发展的多样化、差异化、流动化。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化就是适应这种个性化发展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文化的发展逐渐打破了以往高度组织化的格局,个性化特征日趋突出,这在意识上就必然滋生出去中心、异质性、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流动性等文化观念,从而导致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当代文化发展现实的一种反映。

文化生产和创造的个性化,对于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文化的个性化发展打破了以往的高度组织化,使文化的潜力得到了充分释放、文化的活力得到了极大激发,从而可以大大焕发文化发展的生机。每一种个性的张扬,都可能是催生文化发展的某种力量,众多的力量凝聚到一起,便有可能形成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特别是新文化的创造和原有文化的创新,决不是靠组织化、规模化乃至模式化所能奏效的,更多靠的是个性活力的迸发。因为文化的生产毕竟不同于物质生产,它本质上是一种个性化的生产,唯有其独特性、独创性,才有真正的文化艺术价值。就此而言,文化繁荣发展不能没有个性化。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的过度个性化发展,也会造成文化生产的碎片化,影响文化的健康发展。而且,文化生产的碎片化也难以保证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无法形成整体的、持久的文化发展战略,不利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的过度个性化发展,同时造成文化消费的畸形化。个性化的文化消费主要是为了满足主体的即时需要和快感,它并不关注消费主体文化品位的提升和文化修养的养成,因而消费的结果很难真正起到“文化”即“以文化人”的作用。快餐化、一次性、即时性的文化消费,不仅会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而且会严重影响文化的积淀。因此,个性化的文化消费固然不能否定、抹杀,但更要理性地看待和引导。

五、文化风险的集聚化

研究文化发展,必须关注文化风险,这也是当今时代文化发展一个特有的现象。虽说任何社会都有风险的存在,但在以往社会,因其产生的概率、波及的范围、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因而往往不太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科学技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风险日益增强,以致人们置身于巨大的风险丛林之中。正因如此,今天的社会被德国社会学家乌尔

里希·贝克称之为“风险社会”。贝克认为,马克思和韦伯意义上的“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围绕的一个中心论题是:在一个匮乏社会中,“社会性地生产出来的财富是怎样以一种社会性地不平等但同时也是‘合法’的方式被分配的”;而“风险社会”则是建立在对如下这一问题的解决基础之上:“作为现代化一部分的系统性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和危害怎样才能被避免、最小化或引导?”① 现在,风险社会正在呈现出这样一些显著特点:一是风险源不断扩大。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疾病流行、恐怖主义盛行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能源、粮食、人口、贫困和两极分化等难题交织在一起,也成为风险的重要源头。二是风险性质和作用发生变化。同以前的风险相比,现在的风险形式更为复杂,影响更为广泛,影响程度更为严重。它可以跨越国界,穿越各种社会屏障,对置身全球的每一国家、地区都会产生严重冲击,甚至带来灾难性、毁灭性的后果。三是风险控制的难度增大。由于风险日益具有全球性,风险本身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因而控制的成本和难度也在加大。一种风险控制不力,还有可能引发其他新的风险,使发展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

社会风险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而文化领域则是社会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风险日益突出。文化风险既包括文化发展本身所遇到的风险,又包括文化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尤其是后一种风险更引人注目,其突出的问题是:文化对社会的稳定性功能遭到削弱,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重大威胁,由此引起社会的动荡、分裂。众所周知,文化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是一种重大的凝聚力量。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现了该民族在价值观念、信仰追求、思维方式、心理习惯等方面的共性,因而能在本民族范围内引起强烈的共鸣,它可以凝聚社会民众的共同利益和理想追求,表达和反映民众的共同意志,从而形成较强的感召力和向心力。正是通过这样的力量,可以使整个社会的民众凝聚、动员起来,自觉维护民族利益,积极推进民族振兴。在历史上,文化一直起着这样的凝聚、稳定作用,即使在某些历史时期,一个民族的文化受到外来因素的严重干扰乃至重创,但因其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而凭借其自我修复机制,还可以保持其顽强的生命力。而在当代社会,情况开始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社会各种利益、组织日益出现分化,特别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文化的内外条件和环境都产生了重大变化,在各种力量的冲击之下,文化发展的方式、方法和机制都出现了新的变形,其发展结果也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以致文化的稳定性、凝聚性功能受到严重削弱,文化本身面临严重风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风险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具有集聚化的特征。这种集聚化一方面表现为来自文化领域的各种风险集于一身,另一方面表现为当今时代各种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以及社会风险所带来的文化风险不断加剧。这些风险汇于一体,便形成了风险的集聚化。

文化直接面临的风险,是由文化和文明的冲突所导致的风险。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文明与文化的冲突常常会带来霸权主义的产生,这就使得许多民族文化发展遭致严重威胁,甚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摧残。文化风险不仅在于文化冲突会引起文化上的对抗,而且还在于这种冲突引发政治上的对抗。以恐怖主义为例,近年来恐怖主义的发展、蔓延,其背后就包藏着重大的文化冲突与对抗。恐怖主义除去经济、政治利益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宗教的对抗以及由此唤起的宗教极端情绪。宗教极端思想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和催化剂。而时下进行的“反恐战争”,也决不单纯是针对恐怖主义的,从更深层次来看,它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冷战之后为保持其经济、政治、文化地位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斗争。现在很难知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也很难知晓这场战争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但这场战争的特点是明显的,即它维护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西方的文化霸权。同样是“反恐战争”,各个国家的利益诉求、文化诉求不同,必须抵制借反恐来推行强权政治、文化霸权。

文化、宗教冲突同时是引发世界局部战争、地区动荡的重要根源。中东问题旷日持久,巴以冲

---

① Beck, Ulrich. *Risk Society*,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2, pp. 19 - 21.

突难以平息,其原因与愈演愈烈的宗教文化冲突直接相关。巴以冲突的根源当然并非就是宗教本身,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也有历史方面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将这些矛盾、问题转化为暴力冲突,宗教文化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冲突着的双方,无论是以色列信仰的基督教、犹太教,还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信仰的伊斯兰教,都属于一神论教,终极关切上的排他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行动上的不妥协、不让步,必然导致巴以之间冤冤相报,轮回式报复性仇杀的暴力冲突难以平息,战争的硝烟难以驱除。只要这种宗教文化冲突不停歇,文化风险以至社会风险就会存在,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衍化为战争和军事冲突,给世界带来不安宁。

文化风险影响的对象不仅是民族国家与世界,而且也是个人。人总是生活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受其影响和制约。在全球化条件下,人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而且是全球社会的一个公民。全球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对置身其中的每一成员产生重要影响,程度不同地参与其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其生存、发展。特别是文化作为人的生活样式、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对个人的生活和生存发展有着深层次的影响。目前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是,正像前面所说,世界在经济和技术上越来越一体化,而在政治和文化上则是一个分裂的世界。文化上的撕裂可能直接影响到个人心灵的安顿、文化价值的认同以及精神上的归属,使人变成精神荒野的流浪者。也就是说,在物质层面上,人可能生活得很好,而在精神层面上,则可能无家可归。这对于人的正常生存发展是非常可怕的。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风险正在向常态化发展。文化风险不再仅仅表现为某种偶然性,而且日益具有一定的常规性。由于在全球化过程中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因而体现不确定性的风险的出现也就成为文化发展的常态。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应对风险。对于风险,不应只是消极地对待,应当有意识地将风险看作一种机遇,学会从风险中收益。风险不仅本身隐匿着机遇,而且是创造机遇的动力。因此,不能简单消极地回避风险,而是要敢于直面风险,善于利用风险,在积极应对风险中推进文化健康发展。

上面所讲的文化发展的交融化、资本化、差异化、个性化和风险集聚化特征,可以说是对当今时代文化发展图景的一个大致描绘。通过这些特征,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当代文化发展的现状及其发展走势,从而可以有效地研判我们的文化发展。当代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既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背景和参照系,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发展不可脱离的内在要素和条件。要加强文化建设,必须要有世界性的眼光,善于在与世界文化的互动中推进我国的文化发展。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Development

Feng Ziy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we must have an accurate knowledge and good grasp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Only when we have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cultur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can we see clearly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world structure, and then define the direction and strategy of its development. With the in-depth progr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development mainly indicates such new characteristics as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dynamic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ultural tendency,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aggregation of cultural risk. A profound reve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se new characteristics will benefit the study of Chinese current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 pertinent and rational way.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ontemporary cultural development, new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 刘曙光)